

【文化杂谈】

说好普通话与不冷落方言

□雨茂

今年1月初,监考大学一年级现代汉语课程,最后一题要求学生结合本地情况,谈谈如何保护方言。我看了10份试卷,发现同学们即便搜肠刮肚,能提供的策略仍然很有限。对我这个深受普通话折磨的人来说,题目非常容易,仅瞬间冒出的想法就不下五种,但对这些把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的00后新生,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

31年前,我考入一所位于黄淮平原的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在这所距家乡1500公里之遥的地方,我报到时就遭遇了语言关。一位分配宿舍的工作人员问我:“你‘甲长’来没有?”我一脸蒙,盯着他茫然失措,虽然对方连问三次,我还是一头雾水。对方于是问“你父母来了没有”,这回我终于听懂了,窘迫得一身冷汗。我当即醒悟,他可能问的是“你家长来没有”。对于“甲长”这个怪异发音,我在掌握黄淮次方言的语音特征后才彻底弄明白了,但那已是一个学期之后的事。

开学后,很快就上了中国现代文学课,两个班级合班,老师是天津女知青,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,感觉跟播音员没什么两样。她口才极佳,课堂上很活跃,师生互动频繁,这对于习惯了填鸭式教学的我们来说,感觉特别新奇。我很担忧老师点我的名字,因为我基本不会说普通话,勉为其难的“川普”又让人听不懂。但怕什么就来什么,第一节课老师就点了我的名。活该我“倒霉”,因为按照音序,我的名字排在首位,当然还有老师后来提到的原因——我的姓、名都



是第四声,特别响亮好记。老师的问题是什么,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,只记得当我回答完毕,80名同学集体沉默,彻底蒙圈,连笑场的人都没有。老师却会心一笑,一边示意我坐下来,一边问“你是四川人吧”,我尴尬地点点头。

接下来,老师用纯正的普通话引用了一段话,大意是四川人在家是一条虫,出川就是一条龙,还用现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、巴金等人来佐证。当时,我正处在一种挫败感中,气候、饮食、语言、习俗都不适应,甚至有些后悔出川读大学的决定,但在那一刻,我突然想到了邓小平、朱德、陈毅等人,瞬间涌起一股自豪感,觉得我出川读书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老师当然不是为了恭维出川的我辈,她是要借此激励我勤奋读书,争取一个好的前程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国家并没有强制推广普通话,大学中文系老师也是南腔北调,多数人不会讲标准的普通话,只是“浙普”“湘普”“沪普”等,本省老师干脆就讲方言,让有的学生如听天书。有同学不认真听课,老师就说“你这样不管斤”(不能这样);有同学漫不经心地踩着铃声进教室,老师就说“快胡滴”(快点)。日常方言听多了,也能猜出大意来,但听课就不行了,专业术语太多,许多时候只能借助板书辅助理解,或者根据手势、表情去猜,学习很费劲。生活上也有很多不便,后勤服务人员大多

讲本地方言,同学们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,除东北、河北等地的同学外,大多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,彼此交流并不顺畅。

好在我们的学习能力都比较强,善于归纳总结、求同存异,把难懂的方言口语词汇剔除掉,换用比较好懂的书面词汇,交流基本没有障碍,同时提高了方言辨识能力,这是此前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方言区的同学多,也方便语言、文学课程的学习,比如不能辨别入声字时,就让福建的同学读,一读就记住了;一些古诗词用普通话朗读不押韵,用广东话读马上合辙。

入校一个月后,中文系搞普通话测试,东北、河北等地的同学安之若素,方言区的同学却寝食不安,议论纷纷,我更是如坐针毡。测试由现代汉语老师一人全程操作,我当然通不过。强化辅导一个月后,好歹通过了,但我知道,其实我的方音还很重。毕业三年后,作为教师,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,得益于此前三年语文教学经历,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长足进步,方音轻了,加上一段时期的强化训练,我拿到了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。

二十多年来,教书育人、从事社会活动、到外地进行学术交流,都使用普通话,在家中与夫人、孩子交流,讲的都是普通话,与父母沟通时,当然得说方言,所以我可以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无缝转换。

儿子生下来就接触普通话,连说梦话都是标准的普通话,感受不到我当年因为口音重受到的折磨。我建议他学习本地方言,他不愿意;让他跟

爷爷、奶奶学说四川话,他仍然拒绝。在他的生活、学习与游戏中,普通话很强势,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,根本没有方言存在的空间。当然他也体会不到方言中的地域文化、生活哲理与人情世故。因为不会讲方言,他体会不到什么叫乡音难改、什么叫背井离乡,感受不到“聒碎乡心梦不成,故园无此声”的思乡之情,理解不了“病眼不眠非守岁,乡音无伴苦思归”的意境,体会不到“近乡情更切,不敢问来人”的矛盾心理……

大学时,我每个假期都回家,离家愈近,乡音越重,仅凭口音,就知道家还有多远。同学们也有同感,东北同学出了山海关,就觉得亲切;西北同学过了潼关,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诚……因为故乡不仅是一种地理认同,还是一种历史、文化、情感与语言认同。许多作家坚持用方言创作,有人认,“莫言用山东方言给他的力量,使得他的文学充满着土地的元气,最泥土就是最国际。”许多作家不离故土,日常交流都用方言,比如贾平凹,他还用方言朗诵自己的作品,听了让人荡气回肠。

我看过一则材料,全世界有7000多种方言,大约每隔两周就消失一种。如果方言传承突然断裂,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也会消逝。说好普通话,不冷落方言,也许是目前解决方言式微的最好办法。

►1984年初冬,冯德英与《泉城文艺》同仁登泰山。左为冯德英,右为本文作者郭廓。



【名家背影】

文坛逝英才,『三花』依然红

——悼念著名作家冯德英先生



冯德英先生

□郭廓

寒风刺骨、漫天飞雪时节,惊悉著名作家、我的恩师冯德英先生于1月17日早晨在青岛去世,享年86岁,让人心疼。

冯德英先生1935年出生于胶东牟平一个山村,仅读过5年小学,可谓自学成才。他1949年参军,19岁开始写《苦菜花》,于1955年完成初稿。他把书稿寄到解放军总政文化部,还给陈沂部长写了一封信,希望得到指导。陈沂部长看了初稿,觉得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,就把稿子转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。小说几经修改,1958年得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。《苦菜花》描写了胶东半岛昆嵛地区王官庄的抗日斗争故事,抗日烽火给了冯德英创作灵感。小说出版后广受好评,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,累计出版一千多万册,并被改编成电影,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冯德英先生将8000元稿酬全部捐给了军烈属,他最感恩的是哺育他的家乡父老。

冯德英1958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,任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。1959年10月,《迎春花》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,好评如潮。作品描写了解放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

战争时期胶东人民的斗争生活。之后他又创作了《山菊花》。

1980年春,冯德英从部队转业,来到济南工作。他到济南市文联就任主席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创办一份独具特色的文学刊物。于是《泉城文艺》在他的奔走呼号下应运而生。1984年初冬,他率领《泉城文艺》编辑部同仁登上泰山之巅,以鼓舞士气。我有幸与他同行,一路聆听恩师对文学的真知灼见,受益匪浅。我是冯先生力排众议从工厂调到市文联并委以重任的《泉城文艺》诗歌和评论组的组长,并兼任党小组组长。在编辑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,1983年,当他得知中国作家协会组织诗人赴内蒙古矿区采访团成员有我之时,给予大力支持,使我有了一次深入矿区的经历,创作出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诗歌作品。

著名书画家赖少其书赠的一块“每日煮书”匾额,挂在冯先生的书房里。的确,冯德英先生在工作之余,一直笔耕不辍。1986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染血的土地》,这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长篇系列小说《大地与鲜花》第一部。《冯德英中短篇小说选》1997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,其中收有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和抒发自己艺术见解的创作谈。

冯德英是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家,是“山东省100位为新中国成立、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之一,被中共山东省委、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“山东省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”。但他做人低调、平易近人、生活俭朴,注意培养文学新人。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,曾让许多新闻记者失望。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,他却竭诚相助,分外关心和重视。《泉城文艺》在冯德英的指导下,开辟了“青年诗人”专栏,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作者不惜版面。

冯德英先生曾经说过:“我是在战火中出生、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,我是胶东人民的儿子,我与故乡的土地和人民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。我要永远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,去反映他们的生活,歌颂他们的美好心灵。无论在我前面的路途中有多少困难在等待,我都终将不悔。”

如今,冯德英先生驾鹤西去,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。恩师的音容笑貌永留人间,正是“文坛逝英才,‘三花’(指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山菊花》)依然红”。